

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

李 工 真

提 要：纳粹暴政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使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他们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质资助团体一起采取种种措施，化解了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了事关生死的威胁力，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流亡美国的高文化素质难民潮，从而完成了 20 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洲际移转。

关键词：美国 纳粹德国 流亡科学家 移转

在纳粹暴政时代（1933—1945），从整个第三帝国版图中逃亡出 50 万有犹太血统的难民。面对这场滚滚而来的犹太难民潮，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成为最大的难民接受国，接受了其中的 13 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 13 万人中包括了遭到纳粹文化清洗运动驱逐的绝大部分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和文化精英，从而使这场向美国的流亡变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有关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就开始了。那些在美国援助组织中担任过要职的负责人，通过他们的著作，向人们披露了接受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部分内幕。这类著作突现的主题是“拯救科学和知识难民”，即使其中提及参与原子弹生产的“曼哈顿计划”中的流亡科学家，也很少涉及他们的具体贡献。而且在战后最初的 20 年间，由于受旧“熔炉理论”的长期影响，在有关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上，美国本土派学者仅对这些流亡者与美国社会的“同化问题”感兴趣，关注的也只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能力。这种学术倾向，也许对于研究那些在 19 世纪来到美国的移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类移民绝大多数都很贫穷，并来自落后的欧洲边缘地区，往往属于只受过很少教育的群体，与 1933 年后来自纳粹

Horst Mö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1984, p. 47.

美国“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与他的助手贝蒂·德鲁里合著的《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New York, 1948) 是战后初期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作。

德国的犹太难民有所不同，尤其是这些流亡科学家，不仅来自大专院校的学术环境，而且绝大多数都已经确立了牢固的世界观，以至于他们与新大陆社会的一体化问题，仅仅用那种“同化”标准进行描述已显得远远不够了。

事实上早在1952年冬季，一批1933年后流亡美国的有犹太血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和部分当年参与援救工作的积极分子，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以“文化的迁移”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其内容已开始涉及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神学、心理学、艺术史等领域的影响问题。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果断地批驳了这种“同化理论”的狭隘性。

但是，这种“同化理论”的传统观点和思考角度，直到1960年代后期，才真正发生变化。在越南战争引发的公众意识危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史”的复兴，对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及其政治影响的探讨，改变了移民研究的理论前提。在此，美国的民权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一种新的多元性的理解取代了旧有的“熔炉理论”。它不再从无权的移民群体的消极适应出发，而是将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社会集团对美国社会积极、丰富的影响置于这种移民研究的前景之中。于是，“文化移入”的新术语取代了那些“同化”、“适应”的陈旧单轨式概念，并阐明了这一彼此丰富和变化的充满活力的进程。

1960年代末，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流亡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部分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科学家和美国本土派学者也参与到这场“文化移入”的研究中。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著表明，人们开始对1930年代的这场从德国到美国的“文化移入”的具体细节发生了兴趣，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场“文化移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本土派学者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过去只是力图对流亡科学家与美国的一体化做一种系统性的概括，而现在不得不承认，这种工作只涉及极为有限的视觉范围。而他们过于缺乏欧洲背景知识，这就使他们几乎无法理解由这些流亡科学家带给美国的知识观念与传统。”

最能为这种“文化移入”研究提供欧洲背景知识的显然是联邦德国的学术界。联邦德国的现代史研究曾在战后经历过一段长达约20年的相对沉寂期，直到1960年代中期，尤其当与纳粹政权完全无染而“历史清白”的新一代现代史专家成长起来后，一场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运动才真正地开展起来。但是，联邦德国学术界只是在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政策的研究中，附带地涉及犹太流亡科学家问题，在此，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纳粹种族主义政策之下的文化清洗与驱逐问题。尽管这对于探讨纳粹德国反犹太知识分子政策的动机以及流亡科学家的出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研究仍然不足以清晰描绘犹太知识精英的这场文化转移的整体性图景。

由于这些矛盾与缺陷，197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和美国学术界之间开始了日益广泛的交流。一批来自联邦德国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与科学史专家，带着他们在德国和欧洲各国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收集到的宝贵资料前往美国，并在利用美国当年的援助委员会、基金会以及大学、学院提供的流亡科学家名单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对这场文化转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此同时，美国的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当年流亡者中的第二代人，也前往联邦德国开展广

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 p. 52.

其代表作 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1969.

Charles J. Wetzel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 Madison, 1964.

泛的学术交流活动。这种跨大西洋的学术交往，无疑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由于许多当年的流亡科学家陆续去世，且只留下了很少的回忆录，而这类著作本应向人们介绍这场文化转移的具体细节以及它对美国科学、文化的影响，现在反倒成了秘密。因此1980年代以来，两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科学史专家开始投入到一场“抢救历史”的行动之中。他们通过寻找、采访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推动了传记史、口述史以及“流亡社会学”的发展，以至于国际学术界对这场文化转移的研究在今天已变成了一个专门性的学科领域。各类文化流亡者名单的公布，各种相关人物传记作品的问世，各种对当事人及其后代的访谈录的出版，大量日益接近精确的有关流亡科学家的人数、规模、结构、出版物方面的数量分析，以及对流亡科学家在各具体学科中的贡献与影响的研究，使这一专门性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命运和他们与客居国的一体化问题，而是这场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和意义。

然而，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如此重要问题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少数自然科学史专家在研究诸如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生涯时才有所涉及，远远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透视这场文化转移的意义。笔者相信，通过对历史资料和相关著作的解读，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而强化对这一时代的深层次理解。

一 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及其规模

1933年4月7日是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刚刚被兴登堡总统扶上台两个多月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根据3月23日《授权法》赋予他颁布法律的权力，以政治或种族原因为由，颁布了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具体条文如下：“1. 凡属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辅助性组织的成员；2. 凡在未来有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活动的人；3. 凡在迄今为止的活动中不能证明自身会随时、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4. 凡属非雅利安血统者；这样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与此同时，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干预下，该法还宣布了三项例外条款，即“非雅利安血统者中，只有三种人能免于解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士、1914年8月1日以前就在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

H. Stuart Hughes, *The Sea Change. The Mi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45*, New York, 1975, p. 1.

涉及这些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由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与纽约犹太移民研究基金会合编的涉及流亡世界各国的所有犹太知识精英的 *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 nach 1933*, hg. vom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und der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Jewish Immigration, New York, Bd. , 1980. Bd. , 1983. Bd. , 1983; Hajo Funke, *Die andere Erinnerung. Gespräche mit jüdischen Wissenschaftlern im Exil*, Frankfurt am Main, 1989; Horst Mö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1984; Helmut F. Pfanner (ed.),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 Exile across Cultures*, Bonn, 1986;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D. C. 1983.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Berlin, 1955, p. 11.

或是一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亲或儿子。”由于德国的大学教师过去一直属于在专业上进行自我管理并拥有法定资格的部属公职人员，因此，这场针对德国公职人员的“一体化”运动，在大学校园中也就体现为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的、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

当大量科学家遭到解聘时，所有的德国大学却在4月22日向希特勒政府表达了集体的忠诚。这份在德国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最令人蒙羞的《德意志大学对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纳粹主义国家的表白书》中写着：“这个民族的阳光再度照亮了自己。我们将建设和扩展伟大的元首所开创的事业，并全心全意地追随这个新的国家……我们已经宣布与那种没有土地和权力的思想神话脱离，我们看到了这种哲学的末日……我们认识到：维护我们民族科学的意志在未来将会被记载下来：这场纳粹主义革命不仅体现为一个不断成长起来的政党对现存权力的接管，而且这场革命将给我们德意志的存在带来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彻底变革！”

在这种氛围中，德国的大学上演着一幕幕摧残文化的丑剧。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5月10日夜：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上，纳粹德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到场，主持了一场“对一个世纪的德国文化实施的火刑”。在这场“焚书运动”中，狂热的柏林大学学生将一大批代表“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了火堆。这批书籍的作者包括从海涅、马克思、伯恩斯坦到普罗伊斯、拉特瑙；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到凯塞尔、克劳斯、雷马克、黑塞；从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到巴拉赫、布洛赫、赫夫曼斯塔、楚克迈尔、韦弗尔、布雷希特、奥策茨基、图霍尔斯基。短短几个月内，有近3000种书籍被列为禁书，并被从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清除。焚书与清洗运动显示出纳粹党徒对人类理性成就的公开蔑视，更使人想起德国大诗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

这场从大学校园开始的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运动蔓延到所有的文化领域。1933年9月22日帝国文化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0月4日《主编法》的颁布，使戏剧、造型艺术、音乐、出版、广播、电影、新闻领域里的“非雅利安人”遭到了驱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希特勒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德国统治者，清除犹太人影响的行动继续升级。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彻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为贯彻该法，纳粹政权于同年11月4日下令废除了两年前《重设公职人员法》中的那三项例外条款。当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被尽数逐出校园时，也就标志着德国犹太人在公共文化中影响的最后终结。

所谓“非雅利安血统者”指凡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一人是“非雅利安人”者，它首先是针对“犹太人”、“1/2犹太人”或“1/4犹太人”的。《重设公职人员法》中会出现有关“非雅利安血统者”的三项例外条款，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犹太人的组织“全国犹太人前线士兵联盟”通过老元帅冯·马肯森劝说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直接进行干预，兴登堡总统也同意对《重设公职人员法》的涉及范围进行限制，而希特勒的统治地位当时并没有得到确保，在某些方面还需显示出对总统的迎合态度；二是由于希特勒是一直相信那种诽谤犹太人的宣传的，即绝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逃避工作的人”和“躲在后方的猪猡”，以至于他认为这些例外条款只会涉及很少的犹太前线士兵，因而同意了这三项例外条款。然而“在这部法律颁布后却表明，由于这三项例外条款，仍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还能在他们的职业上继续工作几年。”参见 Avraham Barkai, *Vom Boykott zur Entjudung, Der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kampf der Jude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87, p. 36.

Bekennnis der Professoren an de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Hochschulen zu Adolf Hitler und de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Dresden, 1933, pp. 9, 14, 28.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1983, p. 38.

Trosten Körner, *Die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2000, p. 159.

在这场以种族和政治迫害为背景的文化清洗运动开始之初，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尔 (Max von Laue) 曾经勇敢地站出来，向纳粹当局抗议这场清洗运动给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害。但是，希特勒是这样回答他的：“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

这场始于德国大专院校中的文化清洗运动，给德国的科学带来了巨大损失。历史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科学潜能上的损失。

第一场决定性的解聘潮发生于 1933—1934 年冬季学期以前，一年之内总共解聘了 1145 名大学教师，其中有 313 名正教授，109 名额外教授，284 名非公职性的额外教授，75 名荣誉教授，322 名编外讲师，11 名练习课和外语课讲师，13 名临时委托性的代理讲师和 18 名尚未被正式确立职位的人，占这一时期整个教师队伍 7116 人中的 16.09%。在文化清洗运动来临之前，德国大学的各类正教授与额外教授总计为 4482 人，而首场解聘潮就涉及各类教授 781 名，即占整个教授集团的 17.4% 以上。

第二场解聘潮发生于 1935 年 9 月 15 日《纽伦堡法》颁布后的一年中。到 1936 年 9 月，又至少有 494 名科学家遭到解聘，这些人是因 1933 年 4 月法律的例外条款而暂时保留在大专院校中的“非雅利安学者”，以至于从 1933 年 4 月至 1936 年 9 月，德国大学中被解聘的科学家总数达到了 1639 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正教授或额外教授，其专业领域分布如下：自然科学家 497 人（其中化学家 165 人，物理学家 124 人）；医学家 459 人；社会科学家 392 人（其中经济学家 148 人，法学家 112 人，历史学家 53 人，社会学家 40 人，心理学家 27 人，教育学家 12 人）；人文科学家 291 人（其中语言学家 101 人，艺术史专家 62 人，哲学家 55 人）。至此，解聘率上升到当时所有师资力量的 33% 以上。

第三场解聘潮发生于 1937 年 1 月 26 日颁布《德意志公职人员法》之后。到 1938 年初，在解聘了 160 多名“拥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种类配偶”的教师后，遭到驱逐的科学家已高达 1800 人，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达到了 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损失达到 47%，远远超过了平均率，他们所在的学科也成为损失最大的学科。而在 1938 年 3 月吞并了奥地利后，同样的厄运也立即降临到 400 多名有犹太血统或有犹太配偶的奥地利科学家头上。到 1939 年整个纳粹德国大学教师岗位中的 45%，已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占领。

从根本上讲，这些遭到解聘的科学家今后只有三种可能：完全改变职业、“内心流亡”、“肉体流亡”。对于遭到解聘的非犹太科学家来说，不同学科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些因为有犹太血统的配偶而失去大学岗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等专家，只要不在政治上招惹是非、出头露面，

Edward Y. Hartshorne,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Cambridge, 1937, p. 112.

Ibid., p. 92.

Claus-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1987, p. 19.

Ibid., p. 23.

Christian von Ferber, *Die Entwicklung des Lehrkörpers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Hochschulen, 1864—1954*, Göttingen, 1956, p. 143.

这 45% 的岗位中还包括正常死亡和退休者留下的空位，但接替这些岗位的，不是过去科学接班人队伍中的编外讲师，而是纳粹党的党干部。参见 Horst Möller, op. cit., pp. 41—42.

不从原则上对政权表示怀疑，还有在工业或其他经济部门中从事工作的可能。

而那些非犹太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由于缺乏实践和实际技能等，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在“内心流亡”的情形下，环境的对抗性迫使他们与这个社会分离。在不能参与公开的科学活动的同时，他们抵抗着政治上的压力，在孤立和秘密中继续着他们的科学活动。然而，“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迄今为止的科学和教育功能已被剥夺，过去与学生的接触、与同事的交流也被截断，因此，经济上的拮据，不可信任的环境，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精神空气深深的敌意，是属于这些在‘内心流亡’中生活的原大学教师们的”。纳粹极权独裁通过教育与宣传对私人生活的渗透越深，研究者个人的孤立化就越是尖锐。对政治事件的厌恶耗尽了他们的精力，这种精力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应该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结出丰硕果实的。总之，“内心流亡”实际上窒息了精神生产，“内心流亡者”的书桌是空的，没有手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纳粹时代没有真正知识分子的作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场文化清洗运动主要针对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他们占有所有被驱逐者的90%以上。对他们而言，在社会上寻找其他工作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其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靠犹太人的社团组织提供的临时资助过着“内心流亡”的生活。尤其在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后，当极为有限的“内心流亡”可能性也丧失时，他们除了逃离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同样的局势也摆在极少数非犹太的、坚持民主思想的、过去积极参与政治并遭到解聘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面前，因为纳粹政权是同样将这些人视为敌人进行迫害的。因此，对于这两类人来说，要想求生，最后就只剩下“肉体流亡”，即流亡国外这一条路了，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集中营与死亡。

从这个意义上说，1933年4月开始于德国大学校园中的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本身意味着讲德语的知识难民流亡潮的开端。当然，并非所有受威胁者在1933年都立即理解了局势的严峻性。许多人最初仍然留在德国，并在“内心流亡”中期待着局势能发生逆转，只是到纳粹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后才被迫逃离这个国家。正因为如此，这场知识难民潮伴随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日益恶化而继续，并在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后达到了高潮。

二 决定科学家流亡方向的基本因素

一份有关1933—1945年间讲德语的流亡科学家的调查表明，在所有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中，大约有1400人最后选择了流亡，而他们当中只有约31%的人将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将其他国家作为流亡首选国的比率为：21%选择了法国，14%选择了英国，11%选择了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13.

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 p. 12.

Kurt Düv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Vertreibung jüdischer Künstler und Wissenschaftler aus Düsseldorf,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8, p. 8.

在德、奥两国中，因配偶问题而遭到驱逐的非犹太科学家约有200多人，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者选择了流亡。逃离纳粹德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有犹太血统的人，但是，遭到驱逐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当中，除了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以外，仍有约500多人最后没有流亡出去，他们往往是一些年纪偏大的老教授和老讲师。这些人在1942年1月20日柏林“万湖会议”后，被送往距离布拉格以北60公里的特雷西娅斯塔特“隔都”，在那里，他们与来自欧洲各国没有流亡出去的犹太知识分子一起惨遭杀害，只有极少数侥幸者逃脱了死亡。参见 Kurt Pätzold und Erika Schwarz, *Tagesordnung, Judenmord. Die Wannsee-Konferenz am 20. Januar 1942*, Berlin, 1992, p. 107.

瑞士，选择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的各占6%，还有11%选择了其他国家。就是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自己流亡的首选国。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涉及接受国所能提供的专业岗位的数量，涉及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具体条件，同时还涉及他们对整个局势的主观判断，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与一般难民不同，科学家难民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发挥各自作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功能，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接受国能否为他们提供在高校中的工作岗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高校，由于其社会等级上的封闭性，民族上的非灵活性，几乎完全退出了高校长期岗位提供者的行列。即使有少部分人流亡科学家，后来通过来自美国方面的资助，被安置在高校的短期岗位上，但从欧洲大陆沦陷的最后结果看来，这些国家只是充当了流亡科学家最初的临时避难所和继续流亡的过境国。因此，真正能接受流亡科学家并能让他们继续发挥研究者和教育者功能的，只有那些独立于国家、在聘用问题上更为自由的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在此，两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是英美两国的大学究竟能创造出多少附加性岗位？二是英美两国的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在结构和教育理念上有多大的相似性？因为惟有这种相似性才容易接受流亡科学家。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只有16所大学和45603名大学生。到1938—1939年，也不过有50002名大学生。另外，在1935—1936年，英国的大学教师为3504人，到1938—1939年，为3994人。”这种高校的不景气以及招生数量的停滞，直接构成了接纳德国流亡科学家最为严重的障碍。此外，英国大学的“民族精英教育理念”也明显地将它与德国的大学区别开来，这种理念将“培养国家领导者”作为其教师义务的首要目标，而纳粹时代以前的德国大学，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将科学研究放在教师义务的第一位。加之英国大学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极小，“博士考试和博士头衔直到1918年才开始引入。1930年代初，英国只有2100名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这本身也对安置更多数量的德国流亡科学家产生了阻碍作用，因为德国大学教授最主要的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历来就是专门为培养研究型人才设计的。”由此可见，英国只存在着一种缺乏灵活性的、狭窄有限的大学体制。

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英国知识分子不准备帮助这些遭到驱逐的德国同行。恰恰相反，他们是最早对这些德国科学家表达同情并进行帮助的。1933年5月1日，在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帮助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私人组织“学者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该组织的目的在于：“为德国流亡科学家提供在大学和科学实验室里工作的可能性，以便使他们在英国国内和国外找到永久性位置之前的过渡变得更容易些。”该委员会还于5月22日发表了一份由英国思想界的领导者和知名学者联合签署的声明：“我们筹措的款项，将首先用于保证那些遭受驱逐的教师和研究者的生计，并为他们在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中找到工作机会创造条件……我们惟一的目标是减轻苦难，捍卫教育和科学”。但是，由于英国大学体制上的特点，这种帮助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一些短期性岗位，而不能提供太多的长期性岗位。因此，对流亡科学家来说，英国仍然是首先作为收容港、过境

Horst Möller, op. cit., p. 49.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5.

Ernest Barker, *Universities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932*, p. 92.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7.

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Den Haag, 1953, p. 10.

国来发挥作用的。

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的高校体制在接受流亡科学家方面显然具有好得多的条件，因为它正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在1899—1900年，美国总人口为7599.4万，只有237592名大学生，总共占18—22岁年轻人中的4.01%。而到50年后的1949—1950年，美国总人口达到15069.7万，大学生的数量已上升到2659024名，即上升到年轻人中的19.27%。研究生的数量以更大的规模增长，它由1890年的2382人增长到1950年的237208人，即增长了大约100倍。”这表明，当1930年代初，纳粹政权在德国的大学里疯狂贯彻文化清洗政策时，美国的高校正在经历着一场从精英型教育向普及型教育的过渡。“到1930年，美国已拥有246所各类正规高校，以及总计为27000名授课者组成的教师队伍，其中12000名是教授。”显然，美国的覆盖整个大陆的高校网络，有着比狭窄、有限的英国高校多得多的空间供流亡科学家填充。

然而，如此之多的美国高校并非都适合德国流亡科学家，在美国的自由学院、职业学院、大学这三种性质不同的高校中，自由学院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创造”，它是整个高等教育事业最为重要的基础，所有的大学和绝大多数职业高校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自由学院整个教学计划的重点放在普通教育上，因此，教师的教学能力通常比丰富的学识更为重要。这就使以德语为母语的流亡科学家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更适合指导那些更成熟的研究生，而不是对自由学院大学生的授课。另外，重要的学科领域如法学、医学、企业管理等，在德国是作为专门学科而隶属于大学的，而在美国却被组织在职业高等院校中，这些学院或是独立的，或是划归给某大学的。除从事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外，其他流亡科学家在这里很难找到接受的入口，因为这种教育是纯粹实用主义地以一种职业资格考试为目标的，也是排他性地根据职业要求设立的；加之职业要求在所有民族中又都是有区别的，因而对德国流亡科学家从事专业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

德国流亡科学家一般只有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里才感到自己能够胜任，因为大学的核心部分是研究生学院，它是大学国际化的组成部分。尽管绝大多数自由学院和职业学院也隶属于大学，但惟有研究生学院才显示出美、德大学之间最强烈的亲缘关系。自由的科学研究和指导博士生的工作是交给它的，进行这样的工作也才最适合德国流亡科学家，因为他们能在这里以一种类似于德国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工作。但是，美国各高校“学院(college)”或“大学(university)”之类的名称与质量完全无关，这就使德国流亡科学家通常很难正确地判断并寻找到适合他们工作的学校和岗位。因此，辅助性的代理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至关重要，而这些代理机构通常与这些高校的财源有关。与德国大学不同，美国高校财源中，几乎不存在什么公共性或国家性的参与合作，它涉及的是一种纯私人性质的捐款。这样，美国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对于是否接受某位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态度也就变得极为关键。它们往往能独立于国家，并在与高校的合作中奉行一种接受政策。

美国高校体制的多样性、灵活性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扩张，使得美国在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方面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表明每位流亡科学家都会以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因为流亡科学家的年龄状况、掌握的外语语种和水平、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流亡前的

Alex. J. Brumbaug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1948, p. 50.

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New York, 1947, p. 302.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9.

Alex. J. Brumbaug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 186.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0.

科学接触等这些个人的具体条件，通常决定着他们对流亡方向的选择。

首先，年龄状况在流亡科学家个人流亡方向的选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所有流亡科学家的口头陈述和文字证词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移入美国时，凡年龄超过 40 岁的讲师，与他们更年轻的同行相比，总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对于年龄更大的教授来说，如果不具有国际上显赫的名声，流亡往往意味着他们应付变化的适应能力变小了，因为这些人来自过去安稳的地位，而流亡本身意味着与过去的特别激进的决裂”。因此，在国际局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除了那些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科学家外，主动想要流亡到大西洋彼岸美国去的往往是那些更年轻的科学家，而其他则多选择与德国邻近的欧洲诸国。

其次，流亡科学家个人掌握的外语语种和水平，也对其流亡方向的选择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他能讲英语，就会想流亡到英语空间中去；如果他法语掌握得更好，就会想流亡到法语空间中去；如果他不会外语，就会想流亡到瑞士去，这是很自然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在 1933 年以前，德国是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这种“八方来朝”的局面，使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以前从未想到过要移居海外，也几乎没有、或是根本没有研究过美国。他们既不熟悉美国的日常习俗，也不熟悉它的大学体系，甚至他们当中只有极少的人拥有少量英语知识。因此，在面临危局的时刻，更年轻的科学家往往能更快地学习和掌握英语，而年龄更大的人则“不相信自己还有完全从头开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使用一种陌生语言的能力”。这种态度导致的选择有时甚至是更为关键的。

再者，流亡科学家在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也很重要。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相比，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由于其专业的国际性，更容易被接受国批准入境，并能获得比前者更为优越的待遇。加上所有的接受国，包括英、美在内，这些领域都远不如德国发达，因而聘用这些不构成职业竞争威胁的人，其阻力要小得多。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其专业方向极大地依赖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民族性，这就几乎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最初专业上的“失语性”。与社会科学家相比，人文科学家在这方面往往有更多困难需要克服，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这类社会科学学科正处于时代发展的交叉口上，也是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学科。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医学家甚至社会科学家一般要比人文科学家更容易被接受国、尤其是美国接纳的原因。

另外，流亡前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与交流，也对流亡科学家在接受国的选择上产生决定性影响。凡能在 1933 年以前与国际学术界频繁接触、交往的科学家，大多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处于国际前沿、并拥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至少通晓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自然成为外国大学最想获取的“抢手货”。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等人就属于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甚至在外国讲学期间得知希特勒上台时，便立即决定流亡国外，并得到了接受国快速的接纳与热情的欢迎。

流亡方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流亡科学家对局势的判断。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一

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New York, 1953, pp. 86, 208.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7.

Trosten Körner, *Die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p. 121.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97.

Kurt Düv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op. cit., p. 20.

位后来到达美国的流亡科学家当初都立即下定决心要越过大洋的。因为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人们关于这个政权大概能维持多长时间的推测，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不少人最初甚至相信，“纳粹统治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幽灵，在不远的将来，一场从流亡中的返回是有可能的”。因此“尽管许多人很快认识到流亡的定局，但他们从感情上并不想与德国分离，只是希望能在一个与家乡邻近的国家里，等待流亡生活的立即结束”。他们也并不将自己理解为需要长期离开德国的流亡者（emigranten），而是将自己理解为有返回希望的流放者（exilanten），如果选择流亡美国，仅有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是不够的，因为遥远的美国被他们理解为“不可返回的地点（point of no return）”。

更进一步地讲，对于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来说，美国最初也并不处于他们优先选择的理想接受国的位置上，这本身也反映出德国知识精英那种相当普遍的集体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源于他们过去从美国文化中、尤其是1920年代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厌恶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消极魅力”。尽管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几乎都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美国，而是以相当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美国。“一方面，他们对这个没有严格阶级障碍的开放性社会以及美国人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示钦佩和赞赏，也承认这些能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影响这个社会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美国的那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没有进一步精神需求的物质文化的统治地位持怀疑态度。”这样的矛盾心理也使他们很难在流亡中首先想到要将美国作为首选国。

因此，绝大多数流亡到欧洲邻近国家的德国科学家，只是到晚些时候，特别是在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后，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政权是不会因内部原因而倒台的，也十分勉强地承认一个完全的新开端是必须的，而对于这样一个新开端来说，美国当然能提供最为有利的前景。总之，纳粹德国的对内反犹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越是变得强硬，对一场战争的担忧就越是推动着那些在西欧避难所中生活的人们离开这个旧大陆。这种担忧以及美国接受上的障碍，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在离开德国与到达美国之间通常需要多年的时间。

三 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

1933年4月纳粹德国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出台后，美国《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一直在关注和报道德国大学里强行解聘科学家的事件，美国公共舆论表达的政治同情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被驱逐者一边。5月初，美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发起并成立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该组织更名为“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欧洲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7月5日，142位美国大学校长呼吁对流亡的犹太科学家以及天主教徒给予资助。紧接着，7月13日，一个以康奈尔大学校长利文斯通·法兰德（Livingstone Farrand）为主席的“美国大学援助委员会”也宣告成立。由于这些大学都很穷，因此法

Lewis A. 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New Haven, 1984, p. 3.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24.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p. 60.

德首先呼吁非大专院校的私人组织和机构给予帮助。

“美国大学联盟 (American University Union)” 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家巴格斯特尔·柯林斯 (Bagster Collins) 清楚地认识到, 这场由纳粹政权发动的文化清洗运动为美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次良机, 因而于 1933 年 10 月他亲自前往欧洲进行实地调查。归国后于 10 月 20 日给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特别谈到了他的担忧: “美国高校对参与这场高质量人才分配的紧迫性的认识, 可能会来得太迟”。因为“在此期间, 1933 年 5 月在伦敦为拯救德国科学家而成立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已经显示出极大的现实意义。在当前这场对 250 名流亡科学家进行的国际性分配中, 它已成功地将 140 名科学家分配给了英国的大学, 而被分配到美国的只有 43 名, 他们中的 14 名到了‘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可供分配的至少还有 800 人。但是, 已有 30 人被苏黎世成立的德国难民自助组织‘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 (Notgemeinschaft deutscher Wissenschaftler im Ausland)’分配到了伊斯坦布尔大学”。

为争取更多流亡科学家前往美国, 巴格斯特尔·柯林斯、斯蒂芬·达根、利文斯通·法兰德之间进行了紧急的联系, 动员“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 以 12000 名美国大学教授的名义, 于 1933 年 12 月 12 日发出了一份针对德国大学中暴政的抗议: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对美国信奉的自由基本原则受到威胁感到深深的不安……从长远看来, 没有这种自由不可能完成高质量高水平的大学工作。因此, 本委员会表示坚决的反对。在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欧洲国家里, 首先在德国, 它曾经如此长久和令人崇敬地通过特别的保护, 体现着教学和研究的自由, 这个最高原则现在被牺牲掉了, 并被置于政治和其他考虑之下, 而这些考虑对于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本委员会并不想对无论哪个民族的政治生活或理想发表意见, 但从长远来看, 科学已经被国际化了, 精神生活的条件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都是与每个人的人权联系在一起。”

尽管某些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变得活跃起来, 但是直到 1935 年 1 月 1 日,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安置的 447 名德国流亡科学家中, 只有 95 人被安置到美国, 而且其中只有 29 人在美国高校中获得了长期固定的岗位。

与英国高校狭窄、有限的体制相比, 正在经历着巨大扩张的美国高校体制, 为流亡科学家提供的长期固定岗位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 29 人中有 14 人, 即一半左右被安置在“社会研究新学院”, 而且这种比例直到 1939 年战争爆发以后才逐渐发生了变化。“社会研究新学院”只是一所设在纽约的小小的成人高等学院, 竟然能在为流亡科学家提供的长期固定岗位中占据几乎一半的份额, 这充分说明, 当时的美国其他高校采取了多么克制的态度,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8.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28. 那些并没有大规模接受德国犹太难民的国家, 也能对这场科学流亡产生特别的意义。例如, 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 就没有对利用外国专家的帮助在各个领域中克服这个国家落后面貌的必要性视而不见。恰恰相反, 从 1933 年到 1945 年, 它总共接受了约 200 名无家可归的德国科学家。参见 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op. cit., p. 22.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p. 182.

1935 年 1 月 1 日以前, 流亡的德国科学家在大英帝国、法国、荷兰、巴勒斯坦、土耳其、美国获长期岗位者分别为 49、3、1、24、37、29 人; 获有限期岗位者分别为 172、40、24、1、1、66 人。参见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23.

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p. 314.

这种克制态度暴露出美国科学界在接受德意志流亡科学家的问题上显然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倾向。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通过报刊表达的政治同情，已经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气氛，也唤起了大量完全是非官方的、私人援助的意愿。而且从传统上讲，德国的教育以及大学体制也一直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威望。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曾在作为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的德国大学留过学，而且某些美国大学，如霍布金斯大学，就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少在德国培养成才的美国科学家，此时成为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积极分子。在新政智力启动的背景下，“他们尤其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特别兴趣，而这样的理论问题正是那些在魏玛共和国中体现着现代主义精神的更年轻的德国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如今，恰恰这些人最先遭到了纳粹政权的驱逐。”因此，不少美国科学家看到了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科学发展可能产生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向孤立主义的撤退决定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公共舆论。民意测验一再表明，2/3的美国人都反对松动1924年《移民法》中有关移民限额制的规定；再加上民主党内部南方州派别的强大压力，罗斯福总统只有很小的行动余地。在其他国家都对大规模接受德国难民表现出拒绝态度时，罗斯福总统也越来越担心，“如果美国对移民限额制进行松动，必然导致中欧难民更强烈地涌入美国，也会鼓励纳粹德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反对犹太人和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会刺激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因此美国有关移民限额的规定一直没有松动，在全世界眼中，“美国对德国流亡者的冷漠是最具有典型性的”。

当然，本着美国传统的移民政策中的“才能优先原则”，1924年《移民法》第四条第四款也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申请移民美国前，担任过任何教会神职人员达两年以上并在入境后继续担任这种职务的移民，或是在学院、研究机构或大学任职的教授及其配偶，以及与其同行或寻求团聚的未满18岁的未婚子女，属于非限额的范围”。因此，外国科学家获得入境美国的签证条件是：有一份与美国高校签订的有关工作安排的合同证明，以及一份能证明自身曾在出生国至少从事过某一学科中两年教学工作的证明。但是，孤立主义浪潮同样影响了美国的高校环境。当有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科学家并不缺乏时，美国高校便从1920年代末开始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社会上那种对来自欧洲的颠覆破坏、渗透活动的担忧也同样在大学里蔓延。1933年以后，首先是那些有日耳曼血统的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中西部小型大学中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组成了一个声势不小的反接受犹太科学家的院外活动集团。直到1935年3月，他们仍然将遭到纳粹政权驱逐的德国高校教师斥为“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和“国际谅解的捣乱者”。

这种“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怖症”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得到了加强，大萧条以及由此引起的失业浪潮在高校职业中也有强烈的反映。大量独立的学院和大学都必须采取重要的节约措施。1930—1933年间，在27000名美国大学教师中，已经解聘了2000多名，几乎占全部大学教师的10%。在这种情况下，凡能避免解聘和减少工资的地方，通常也是缺乏手段来聘用附加

Dietrich Goldschmidt, *Transatlantic Influences, History of Mu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American and German Education*, Albany, 1983, p. 1.

Kurt R. Grossmann, *Emigration, Geschichte der Hitler-Flüchtlinge,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9, p. 9.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6.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29.

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p. 302.

性教学力量或创造新岗位的地方。甚至在那些能避免解聘和减薪的地方，德意志竞争者的涌入也是被年轻的讲师视为自己晋升机会的一种威胁来看待的。

在高校里，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传统孤立主义的影响，对德国事态发展的无知，汇合成一种混乱的愤慨，并首先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中找到了表达。例如，1933年5月，当“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向他的同事说明，需要为遭到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建立一所“流亡大学”时，许多人表示不愿给犹太人在美国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嘲笑道：“在这些德意志人中寻找一流科学家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只是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因此，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在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美国那些热情工作的援助组织准备应付第二场大难民潮时，许多美国大学却在有目的地破坏这种努力。一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给各大学的“对使用流亡科学家有哪些兴趣？”的调查表，不仅返回的数量大得惊人，而且大多还强调：“我们不认识他们，也不需要他们！”

美国高校中的这种反犹主义倾向，或是通过犹太人的外貌，或是通过民族习惯上的差别，或是通过个别流亡者的行为举止来获取认知的。它使许多德国流亡科学家很快认识到自身作为“犹太人”和“外来新移民”的“双重不利条件”。在欧洲，这些流亡科学家受到了肉体上的粗野威胁，而在美国，他们又面临着对人的尊严委婉的拒绝，以至于流亡美国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从自尊的角度出发，认为“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比美国还少些。”甚至连像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这位192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竟然也被霍布金斯大学的反犹校长、日耳曼语言学家艾塞阿·鲍曼（Isaiah Bowman）强令逐出校园。由此可见，在美国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与其说是资金问题，还不如说是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的情绪问题。

许多援助组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在与其他国家的援助组织达成跨国协定方面保持中立。这种策略考虑竟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1933年11月在接受经济法专家阿尔图·努斯鲍姆（Arthur Nussbaum）的问题上，就连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巴黎办公室的代表特蕾西·B. 基特里奇也认为，必须向那些可能对他感兴趣的美国高校小心翼翼地指出，他“长有相当明显的犹太人的外貌”。那位1932年才受聘于哈佛大学的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也曾想到要建立一个临时性的援助组织，以便能为那些受到危及的德国同行做出安排，但由于考虑到哈佛大学里的情绪，他也只能表示“尽可能少地要犹太人”。

这就使人很难断定，是否真实的政治道义感或赢得最优秀人才的国际竞争压力决定了那种资金上的帮助。无论怎样，美国的援助组织，如果不想故意激怒大学中的仇外或反犹情绪，就必须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扮演角色。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9.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30.

Investigat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9. 193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 (以下简称 RFA), Record Group 2, 185/1324.

Lewis A. 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p. 71.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98.

Tracy B. Kittredge to Sally H. Walker, 11. 22.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113.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30.

四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

众多的美国援助组织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它是早在1920年代就盯上了最有价值的德国科学家的惟一基金会组织，也是能为流亡科学家提供最多资助的美国基金会组织，因而在这场援救流亡科学家的行动中，它对德国局势的看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与1933年5月以来各国自发建立的所有援助组织不同，这些组织在这个陌生的领域里或多或少只是在“即兴作曲式地”进行它们的工作，而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的步骤，却在继续自1920年代以来就一直进行的研究计划。它不仅掌握了有关欧洲、特别是德国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个人的详细情报，而且在它设在巴黎的办公室的帮助下，支配那些有组织的援助机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领导人约翰·范·西克勒(John van Sickle)在认识了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几天后，就在英国推动了“学者援助委员会”的建立。

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于20世纪初，洛克菲勒石油王朝为此投入了2.5亿美元，仅每年的利息就达800多万美元。在最初的20年里，它几乎一直是排他性地资助医学、尤其是热带病学研究，1920年代中期以来，才逐渐对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兴趣。利用它的捐款，这家基金会先是在美国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后又在欧洲，首先在德国资助了大量的科研项目。该基金会1933年6月20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29—1933年，它总共为社会科学研究投入了1780万美元，其中有约83万美元为下列目的投向了德国：资助柏林、基尔、海德堡和慕尼黑的图书馆137500美元；资助各高校研究所的研究金额共为239000美元(其中汉堡国际法研究所20000美元，海德堡社会科学研究所60000美元，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30000美元，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000美元，柏林政治高等学院110000美元)；跨大学的研究奖学金150000美元(其中人类学研究125000美元，国际关系研究25000美元)；奖学金4150美元；56份前往外国为期2年的访问学者奖学金300000美元。

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便开始有规律地巡游德国，在仔细考察德国大学的过程中，关注着德国社会科学界已取得的成就。大量有关这类收集信息的旅行报告，不仅为观察纳粹夺权准备阶段中德国高校的政治气氛以及知识分子状况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视角，而且还显示出，基金会派往巴黎的代表已经在寻求资助什么人、并按什么标准来进行资助。这些代表个个都是行家，其中不少人自己就曾在德国和欧洲读过大学。例如，跨大学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就曾得到过资助，其目的在于证明：“那种为纳粹主义宣传以及它的知识分子帮手从科学上视为合法的种族学有多么荒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德意志教授协会”的一再批评：“这种‘老年化的绅士协会’，只是在根据自己的专横，为那些油滑地适应保守主义的后继者提供着一种机会。在社会科学中，通过这些老教授，普鲁士官僚主义的思想传统得到了继续，而科学被哲学上的空想所混淆，正如在经济学中还一直有着极大影响的‘历史学派’那样，科学被没有理论根基的苍白描写混淆了。”

John van Sickle/ RF Paris to Central New York, 5. 1.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41.

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s, 6. 20. 1933, RFA, Record Group 1.1, 717/7/36.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42.

Kurt Nemitz, *Antisemitismus in der Wissenschafts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Köln, 1983, p. 377.

相反，那些在魏玛时代被排斥在“德意志教授协会”之外的更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则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浓厚的兴趣，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成果受到了越来越热情的关注。例如基尔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所，由于它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和以国际化为方向的研究，被该基金会视为现代德意志经济学的“麦加”。该基金会也对海德堡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和埃米尔·雷德勒（Emil Lederer）的工作，对科隆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在汉斯·克尔森（Hans Kelsen）和他的助手埃里希·胡拉（Erich Hula）领导下的工作做出了类似的评价。给该基金会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法兰克福大学那些批评型学者所涵盖的专业宽度：他们当中有这样一批著名人物：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ennheim），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Adolf Löwe），劳动法专家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及经济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Eugen Altschul）。总之，法兰克福大学由于其开放式的国际氛围而被该基金会视为“最强大的科学中心之一”，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非常乐意为它投入更多的资金。然而，由于这些代表着社会科学研究新方向的人大多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因此该基金会也有所顾虑，担心这样做会在德国公共舆论上引起消极反应。这就使洛克菲勒基金会面临一种困境：一方面它并不认为那些德国传统中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资助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担心，由于这里的政治舆论氛围，若是更多地资助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新研究萌芽，是否会给这些犹太学者带来麻烦。

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是出于政治信念才资助德国的这类批评型研究的，而恰恰是在魏玛共和国社会政治的极端条件下，这些在德国由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方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特殊的民族利益相遇了。这家基金会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提出资助社会科学的计划，是因为它认识到，在美国，与自然科学正在逐步取得的进步相比，关于现代社会的知识以及控制充满活力的工业增长的技术远远落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后面。这就必须首先促进这种知识的增长，以便能将掌握在手中的、内行的社会技术专家变成一种能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也涉及“简化并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启迪方法。尤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崩溃以及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有关经济计划和控制的研究课题自然成为了该基金会资助的重点之一。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欧洲经济学家群体，如德国的“基尔学派”和“海德堡学派”、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荷兰的“荷兰经济学派”、维也纳的“奥地利学派”等，都得到了它的资助。

在1933年4月德国大学开始大规模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一贯推行的实用主义资助政策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面对希特勒这个新独裁者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恐怖政策，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此，基金会内部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它反映出这个在科学发展上承担了义务的组织，自己尚没有完全从反犹太主义潮流中解放出来。

基金会驻巴黎办公室的代表，首先是负责医学分支的代表丹尼尔·奥布里恩（Daniel O'Brien），显然受到了反犹太主义偏见的影响。尽管有长年对德国局势的观察，奥布里恩却在4月11日提出了一份有关德国局势安定人心的报告，它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纳粹主义政策的理解：“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忘记了：1918年，在德国，激进派，压倒优势的是犹太人，掌了权，并带来了那场社会的彻底变革……人们不要忘记：在过去的15年里，犹太自由主义因素在德国曾得到过相当程度的促进。尤其在社会科学中，许多科学家被解聘要归因于这个事实：即这个领域

John van Sickle, Suggestions for a German Trip, 5. 31. 1932, RFA, Record Group 2, 77/617.

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s, 6. 20. 1933, RFA, Record Group 1.1, 717/7/36.

Memo Program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3. 1929, RFA, Record Group 3, 910/1/1.

中的发言人是犹太人和社民党人……在德国，大量公共机构中‘犹太人超代表性’的不合理状况并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以至于了一场革命的危险在德国仍然是真实的。正因为如此，纳粹党才贯彻了对这种威胁的扫除。驱逐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外国人，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短期性的措施”。因此，这份报告建议：“等待下去，并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在德国已有的计划”。

在这种设想下，巴黎办公室领导人西特勒也向纽约总部建议，“应只资助那些被解聘的、仍留在德国的科学家”。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幻觉：“尽管纳粹不会再聘用这些科学家了，但由于考虑到外国舆论，估计不会继续采取反对这些科学家的措施，当这些科学家能通过其他的私人手段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时，纳粹党应乐于看到这一点。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放弃迄今对那些研究机构的资助，不应将资助转向难民，不要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就仿佛我们只愿意与‘犹太科学家’合作”。

不仅是这些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报告，而且连美国紧急委员会派驻欧洲的代表发回的大量报告也显示，他们是以冷淡的态度，甚至是以满意的心情来看待德国大学里的这场解聘潮的。这也显然感染了那些外国新闻记者。不少后来流亡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在接受采访时都曾对外国舆论倾向于希特勒的观点进行过控诉：“这类外国舆论完全使人们相信，希特勒首先是在与共产主义做斗争”。

西特勒甚至建议：“在批评型的科学家被解聘后，应继续资助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完全不清楚，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以后是否还能继续那些意义重大的研究，因此总部负责人雷蒙德·B·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委托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领导人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于7月20日前往德国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当此人对基尔研究所新领导层人事的纯洁性和科学的真实性做出否定的结论时，福斯迪克才开始考虑到，“投入的研究经费应被撤回”，并做出了如下的判断：“若继续在希特勒的德国承担义务，这笔钱只会毫无意义地扔到窗外。”1933年9月底，纽约总部安排，开始有计划地从德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撤出，不再提供研究经费和图书馆建设经费，那种资助前往外国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项目，开始转向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援救计划，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了141万美元。

这些资金很快投入了使用，因为那些在1933年以前就得到过这家基金会资助的德国科学家，大多属于第一批遭受驱逐的人，并构成了这类流亡者中最大的群体。他们过去就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人员有过接触，因而在1933年9月以后，很自然地成为该基金会提供援助资金的首要人选。10月初，第一批共7名科学家得到了该基金会的资助。他们当中的2人，即海德堡大学的埃米尔·雷德勒、汉斯·施佩尔(Hans Speier)被安置到美国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其他5人，即“基尔学派”的首领阿道夫·勒韦，海德堡大学的雅可布·马夏克(Jakob Marschak)，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以及科隆大学国家法专家汉斯·克尔森，通过“学者援助委员会”被安置到了英国。“这些人的工资完全出

Daniel O'Brien to Alan Gregg, 4. 11.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John van Sickle to Rufus Day, Director of Social Science Program, 5. 8.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46.

John van Sickle to Rufus Day, 5. 5.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20/181.

Raymond B. Fosdick to Sally H. Walker, 9. 25.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141/1050.

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笔预算，进一步的工作合同也早已签订。”

尽管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一场抢救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运动开始了，但是由于美国高校中极为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加上若没有外来资助，英国高校也只能安排数量有限的长期岗位，法国高校甚至难以长期安置这些流亡科学家，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的援助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将流亡科学家安置在欧洲的。例如，“到 1935 年初，已有 135 名遭受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其中 34 人到了英国，16 人到了法国，18 人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另有 67 人到了美国，占当时流亡美国的 95 名德国科学家的 2/3 以上。”“而到 1939 年 9 月战争爆发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流亡科学家达到 192 人，其中 70 人被安置在英、法等欧洲国家，122 人被安置在美国，他们当中有 74 名社会科学家，45 名自然科学家，35 名人文科学家和 38 名医学家”。这些被安置者尽管只占有德国流亡科学家中的很少一部分，但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流学者。

五 美国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能否化解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关系到美国能否大规模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的问题。这一工作领域并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私人基金会所能完全包揽的。私人基金会一般只负责为它们挑中的人选提供资助，具体由哪所美国高校来接受这些流亡科学家，这方面的中介工作主要是由“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来承担的。

在这种中介工作中，美国的“紧急委员会”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以及设在苏黎世的“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两大欧洲援助组织往往能掌握并提供更为全面的有关德国流亡科学家的名单和信息。这三大自发组织之间很快发展起一种协商和分工。“紧急委员会”负责在美国的中介工作，“学者援助委员会”负责在英国和帝国所属殖民地的相关工作，“紧急共同体”曾经成功地将部分德国流亡科学家介绍到土耳其，因此由它来负责在东方国家、苏联和南美等方面的中介工作。

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相比，美国的“紧急委员会”显然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这种区别本身也反映出两国援助组织各自面临的不同局势。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将自己定义为一种智力劳动市场组织，自己来挑选科学家，然后介绍给各大学，并为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承担部分工资。最初，这笔经费的绝大部分是由英国科学家以一种自我征税的形式来筹集的，这也显出英国科学家比美国同行有更高的义务责任感和更多的团结一致。1933 年 9 月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通过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英国的慈善组织的有力资助而得以改变。而美国“紧急委员会”的业务政策一开始就建立在与英国不同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孤立主义舆论笼罩下的大学财政问题，为了将更多优秀的德国学者引向美国，斯蒂芬·达根将这个“紧急委员会”与已有的各类私人基金会紧密地衔接起来。用这种方法，能让大量慈善性的、绝大多数是美国犹太人的基金会提供大量的金钱，以供“紧急委员会”操作。

在此基础上，“紧急委员会”根据三项原则来采取行动：“1. 在中介活动中，无区别地对来自所有宗教的信仰者；2. 只推荐 30 岁至 58 岁的教授和编外讲师，以避免与年轻的美国人竞

List of Appointments Made, 9. 7.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4.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p. 47, 38.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35.

William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 London 1959, p. 126.

争；3. 只接受来自美国高校的申请，而不接受流亡科学家个人的申请。”也就是说，流亡科学家由各高校自己挑选，某高校若想安排某位流亡科学家，便可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便给这位候选人安排一个位置，如果这位候选人接受，那么该委员会愿在最长两年时间里为被聘用的科学家承担一半工资，即每年最多为2000美元。“由于工资的另一半通常由用人机构的科研基金来承担，而这种科研基金实际上也来源于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因此在头几年里，美国各高校在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上并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除了这种减轻大学经济负担的方法外，“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人还采取种种措施来消除人们对它们安置政策的误解，表明这种政策绝非出于博爱和仁慈，“不是在为个别科学家提供个人帮助”，而是在奉行“拯救科学”的最高原则。因此，只有一流的科学家才能得到资助。由于这些一流科学家在美国大学里一年最多只能拿到一笔4000美元的工资，而一位美国的一流科学家一年能拿到12000—15000美元，这种区别使美国各高校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抵制情绪逐步得到了化解。

在这场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中，阿尔文·约翰逊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为吸收流亡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一所“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并以此来作为它的研究生院，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吸收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哥伦比亚大学更是对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采取了整体接纳的形式。这些高校的领导人对德国流亡科学家表现出极大的接受热情，甚至允许他们在完全脱离本科生教学活动的情况下，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但是，除了这些极少的例外，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一般都被“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意识地、也是分散性地安置在各个不同的高校里，一所高校接受的流亡科学家一般不超过3名，这样，流亡科学家完全集中于少数中心的现象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敌意被消解掉了。

最初，“紧急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这种安置工作在两年后会结束，估计这场科学难民潮到那时也就结束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也将走到尽头，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与这种估计相反，随着希特勒德国1938年3月12日吞并奥地利、9月29日占领苏台德、11月9日导演了“帝国水晶之夜”后，越来越多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意大利的流亡科学家都在急于寻求美国的帮助；而美国经济却在持续萧条中迎来了1937—1938年的危机。因此，尽管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捐款在不断增加，但“紧急委员会”仍然感到资金不足，难以应付。过去对流亡科学家承诺的两年资助义务，只能履行一年了，甚至不少流亡科学家在两年期限合同结束后，再度变成了失业者。在这种形势下，“紧急委员会”于1938年12月1日开始引入了一项规定：大学只应继续资助那些“被聘用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科学家”。但是，“被安置在长

Stephen Duggan, *A Professor at Large*, New York, 1943, p. 78.

William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 p. 30.

Raymond B. Fosdick to Alvin Johnson, 10. 30. 1939, RFA, Record Group 1.1, 200/339/4304.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37.

“社会研究新学院”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最多的避难援助，总计为540235美元。这也是这所“流亡大学”能在1945年以前拯救180名欧洲流亡科学家的重要原因。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40.

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122名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65所美国高校里，而在1933—1945年间，335名通过“紧急委员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145所美国高校里。参见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p. 66.

期固定岗位上的流亡科学家，还不到所接受的流亡科学家总数的一半。例如迄今为止，依靠‘紧急委员会’的帮助而得到安置的125名科学家中，只有55人获得了长期固定岗位。”12月13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福斯迪克在给约翰·D·洛克菲勒的信中，开始谈到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是否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

无论如何，“紧急委员会”承担的工资部分必须极大地减少。1933年支付给流亡科学家的一半工资最多为2000美元，而到1938年，平均只能支付给每人1400美元。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随着更多流亡科学家涌入美国，“紧急委员会”只能支付1000美元了。而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希特勒德国占领西欧大陆并向英国发动空袭后，不仅是那些过去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法国得到安置的德国流亡科学家必须全部转移到美国，而且已经被安置在英国的部分德国科学家也必须转移到美国，更不要说还有那些来自法国和西欧其他沦陷国家的科学家、尤其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在争相向美国转移。面对流亡科学家的蜂拥而至，“紧急委员会”最后只能将被安置者的一半工资减少到每人650美元。

然而，欧洲局势的恶化迫使美国社会逐步放弃孤立主义。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最先到来的德国流亡科学家，此时已开始用他们在美国取得的杰出科学成就证明，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被驱逐出来的科学家的潜力多么巨大，接受流亡科学家使美国高校的质量得到了多么大的提高。这就使美国各高校和整个知识界对流亡科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紧急委员会”与“美国大学联盟”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由各美国高校向流亡科学家支付更高的工资，以便使他们部分的工资损失能得到弥补”。另外，“在最初承诺的期限满期后，无论他是否占据着长期固定岗位，如果他证明自己胜任这份工作，那么这所高校就要完全接受这位客人，支付他全部的工资，并将他接纳进该校的教师队伍”。这样就开始了过渡到由美国各高校支付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的全部工资。

据统计，从1933—1945年，为了使美国各高校能接受更多的流亡科学家，各家大私人基金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具体资助的金额如下：“紧急委员会”为335名科学家提供了80万美元的资助，这笔总额中有31.7万美元来自纽约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为303名科学家提供了141万美元的资助；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为300多名科学家提供了31.7万美元的资助。另一家大的科学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以私人捐助给其他组织的形式提供了总计为11万美元的间接资助。有关它们批准的人事资金总结算，提供了一幅有关这场知识难民潮的结构、资助重点等方面具有说服力的画面。

“紧急委员会”资助的335名科学家中，有137名人文科学家，110名社会科学家，81名自然科学家，7名医学家。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303名科学家中，有113名社会科学家，73名自然科学家，59名人文科学家，58名医学家。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资助的300多名科学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p. 196.

R. Aymond B. Fosdick to John D. Rockefeller, 12. 13. 1938, RFA, Record Group 2, 167/1217.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37.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50.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p. 85.

Ibid., p. 193.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303名流亡科学家中有191名德意志人(占63%)，36名法兰西人，30名奥地利人，12名意大利人，11名波兰人，6名匈牙利人，6名西班牙人，5名捷克人，斯堪地那维亚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各2名。参见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38.

家，大多是在3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在美国各大学已有2000人被辞退的情况下，即使对30岁以下的美国人来说，高校中的职业聘用机会也很难提供给他们，现在当然只提供年龄超过30岁以上的流亡科学家。然而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突破了这项规定。对它所提供的资金进行的一种比较研究表明：它为大量更年轻的科学家提供了数额相对更少的奖学金，因为由它资助的科学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家一样多，而由它所提供的经费总额还不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的20%。从1940年代初开始，为解决更年轻的流亡科学家的聘用问题，“紧急委员会”专门制定了针对年轻流亡科学家的“访问学者计划”，为此，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西尔家族遗产基金、罗布克百货康采恩遗产基金也通过一种特别的捐助承担了义务。

此外，美国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社会各界大大小小500多个慈善组织，尤其是贵格会教徒组织，以及犹太人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好莱坞”各电影公司，为营救来自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并没有限制在流亡科学家身上，而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凡表明需要帮助的地方。”大量有犹太血统的法律工作者、医生、记者、工程师、音乐家、造型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文化职业者，正是通过他们的鼎力相助，才获得了财产上的担保并在美国找到了栖身之所。这类工作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帮助，还包括一种不断扩大的语言训练和咨询活动。这类活动足以经常性地减轻知识流亡者感情上、语言能力上的负担。例如，贵格会教徒组织为此专门设立了“难民部”，并为流亡知识分子举办“美国研讨班”，其目的在于，通过几周的共同生活、报告会以及与美国同行一起进行的语言训练，使德国知识难民能熟悉并逐步融入新环境中。正是通过贵格会教徒组织的扶助，不少过去从未在德国大学讲过课的律师、记者、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其他人士，也能转入美国高校从事教学。

到1945年，美国已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受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到美国的犹太难民总计达13万之众。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以上）是教授；其余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学者型和艺术型的文化流亡者，具体数字如下：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这意味着从德、奥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这就充分说明了美国接受的犹太难民中所特有的文化知识“含金量”。

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p. 36.

Charles J. Wetze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 Wisconsin, 1964, p. 339.

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p. 520.

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51.

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p. 15.

在德、奥两国大专院校中遭到驱逐的约2200名科学家的基础上，若将威廉皇家协会各类科研院所中被解聘的专业研究工作人员、自主开业的医生、律师等加进去，总数约有7500名；若再将与文化有关的遭到驱逐的自由职业者，如建筑师、时事评论家、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之类的人也加进去，那么，在不将他们的家庭成员计算在内的情况下，总数达12000名左右。参见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p. 23.

六 结 论

1933年4月从纳粹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这场文化清洗运动首先是针对有犹太血统、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意味着多少世代以来犹太人对中欧文化的适应突然间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尽管从比率上讲，约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并不代表德语文化空间科学潜力的全部，而且从德国大学中遭到驱逐的1800名科学家也只占其中的39%，但是从质量上讲，他们却代表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替换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然而，在出逃的约1400名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当中，只有不足1/3的流亡科学家首先选择了美国，而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他们流亡的首选国。尽管这些流亡科学家主观上的犹豫，对于推迟他们移入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因为它不仅限制了罗斯福政府在接收犹太难民问题上的行动余地，而且也加剧了美国高校中普遍蔓延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在美国经济仍然处于萧条的状况下，这种恐惧症中反映出来的反犹主义情绪，本身也阻碍着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显然，一场流亡科学家向大西洋彼岸的整体性移转，还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流亡者前往美国的主观愿望，能提供工作岗位的美国大学的欢迎态度，大量资金作为这场移转的有力支持，国际局势的紧迫性所造就的压力等等。

为打破这种流亡与接受之间的僵局，美国知识精英人物组成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质资助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逐步化解了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和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一种事关生死的威胁力。它不仅迫使美国社会逐步放弃了孤立主义，也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他们当初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文化素质的知识难民潮，这场知识难民潮，正是在纳粹炮火的逼迫下，才流向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接受这场以上千名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知识难民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流亡美国的意大利原子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夫人劳拉·费米，曾在1968年出版的关于欧洲知识分子流亡美国的著作中，计算过流亡科学家给美国教育制度带来的那种不花成本的赢利。据她估算，“在美国，培养一位科学家到他能开始职业生涯为止时的费用，至少需要45000美元，仅是在那700多位移入美国的德国大学教授身上，就为美国节约了大约3200万美元”。

这种表面上看来精确的有关教育经济上的赢利数字，与对美国科学发展的根本性促进相比，显然只展现了次要性的表征，这种促进主要是由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建筑学领域中的德国流亡科学家给他们的接受国——美国——带来的。人们能在有关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的材料中找到这方面最鲜明的例证：1933年以前，美国曾有5名得主，在世者只剩3

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p. 3.

名；德国曾有 31 名得主，在世者仍有 19 名。然而，仅是这场从 1933 年开始的德国科学家的流亡潮，就为美国送来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 6 名得主以及后来的 11 名新得主。到 1945 年，德国 1933 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只剩 9 名，加上新增加的 5 名，总数为 14 名；而美国 1933 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虽然只剩 7 名，但由于有这批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欧洲新生科学力量的加盟，却迅速新增加了 18 名，使总数达到了 25 名，从而远远超过德国，成为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这 25 人中还不包括那些 1945 年以后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流亡科学家，也不包括那些随父母到达美国后才完成学业、并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代流亡者。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总计已超过了 200 名，这显然与这批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开拓的新方向，以及由此在美国高校中营造出来的特殊学术氛围紧密相关。

1969 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了一份涉及所有学科领域中最为杰出的 300 名流亡科学家的传记名单，他们当中的 79%，即 238 人是从纳粹德国版图内逃亡出来的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正是他们，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1989 年，法兰克福德意志图书馆公布了一份有关讲德语的文化知识精英在 1933—1945 年流亡期间出版的文化、科学论著的档案，其中涉及 11846 本学术专著和 7749 篇科学论文，它们当中的 80% 以上是在美国完成的。所有这些，不仅说明纳粹暴政导致的这场流亡给美国科学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收益，同时也说明它给德国科学造成了多么沉重的损失。最早看到这场流亡给美、德科学潜力带来彼此消长意义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们，他们用这句话来评价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我们应该为希特勒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感谢他为促进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总之，正是希特勒种族政策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正是目光远大的美国知识精英以及美国私人基金会组织的援救努力，才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洲际大移转。

[作者李工真，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430072]

(责任编辑：姚玉民)

Wolfgang Benz,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München, 1988, p. 412.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1969, pp. 675—720.

Deutsche Bibliothek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s Exilarchiv 1933—1945, Katalog der Bücher und Broschüren*, Stuttgart, 1989, p. .

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p. 78.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characterized by paralle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officials at the same rank at high administrative levels, that is, the “separate system” at high local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scope, the separate system enabled a redistribution of local power in favo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contributed directly to the increased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in the Song compared with previous dynasties. In the Southern Song, it was increasingly common for an official to take several position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at the same level, which led to the de facto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organs. In the meantime, a cross-level quasi-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merged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igh-level local administration. These two factors weakened the separate system and centraliza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compared with the Northern Song.

The Expression and Meaning of “Ye” in Qing Dynasty Civil Law

Li Li (131)

“Ye” (業) is a basic concept for property rights in Qing private contracts. It was applied to various property rights such as ownership of land, farming land (land rent tenure), share of partnership assets, ownership of salt wells, tenure and pawning. The core of the concept is the right to benefits rather than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Compared with the modern civil law system that divides property rights between *jus in rem* and *res suum*, the right of “ye” seems more inclusive. In the Qing Dynasty, private contracts were claims that confirmed the transfer of rights in the transaction of the right of “ye,” and provided proof of the belonging of the right of “ye” after the transaction. Understanding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ye” in the Qing Dynasty civil law will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 law.

The Intercontinental Transference of Scientists in Exile from the Nazi Germany

Li Gongzhen (143)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 leaders saw in the Nazis’ cultural cleansing a good chance of promoting U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by receiving exiled scientists. Together with private sponsors, they employed a variety of means and managed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by eliminating the widespread fearfulness over foreign scientists on campus. At the same time, the success of Nazi Germany’s expansionist policy before WWII and the blitzkrie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created a life-threatening situation that forced most of emigrating scientists from Germany and German-occupied countries to give up their hope of staying in Europe. Hence there took place an unprecedented exodus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highly educated refugees, a movement that saw a historical shift of the world center of culture and science across the continents.

Review Essays

Dunhuang Studies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Rong Xinjiang (165)

The Study of Women’s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Liu Yaochun (176)

New Books Abroad

Ronald Suleski :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 Tradition , Modernization and Manchuria

Tao Jiye (188)